“向内检视”与“向外追寻”：东北事变后民众的舆论与审思

张兆涵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 100080）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众认识到事变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西方国家、国联等势力的介入，东北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力量角逐，更关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益博弈。东北事变的发展与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进展同步，因此，东北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仅仅依靠东北民众，而应举全民族之力。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对于中国在国际世界中的地位和西方世界面貌的认知也更加清晰，呈现出一种“向内检视”中国革命路径和革命力量，“向外追寻”近代中国更好融入世界，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解决民族危机的相互套叠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言说；外部世界；革命路径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099-09

收稿日期：2024-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2VSZ087）：北京大学收藏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张兆涵（1998-），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04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东北三省，此后仅三月有余，东北全境陷于日本之手。东北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当时国内的广泛关注，东北地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升降随之发生变化，东北问题也成为时人关注的命题。时任南开校长秘书的傅锡永先生在事变爆发后劝勉南开学子关注东北和中日问题，他在演讲中进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险”。① 人们在叹惋国土沦丧的同时，亦反思如何解决繁复的东北问题，更清晰地认识到，“东三省的问题在表面上好像是东三省的局部问题，其实与中国整个问题，有密切关系，将来一定是和中国整个问题同时解决的。”② 东北事变的爆发促使民众审思中国革命的路径，向内整理和审视当时革命道路和国民心理等层面存在的问题，更敦促人们把眼光投射到东北以外的地方，将全国的抗战历程与东北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

一、“为民族的独立而急”：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涨

“九一八”事变使得民众更认清东北与中国、东北与中华民族之关系紧密，人们的民族观念逐渐从模糊抽象的爱国情感转变成有国界、疆界、领土之分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日本暴行，时人有感“在每次的国耻事件以后，虽然我们的人民是消沉的，但多少是唤起一部分人来，纵然他们是怎样的渺小和微弱，但终於是一线的新生命”③，更感慨“九一八”为“实是中华民族从来所未受过的仇耻，也就是中国历史空前所未有的祸变”④，民族意识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也正是在一次次国家危难中得到凝结和升华。

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最初人们是用民族、种族的观念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以致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缺乏“合大群”“结团体”之意识，过去“外国所以侮辱我华人者，以我国

①傅锡永讲，高仲元记：《日人强占东北之由来及吾人应有之认识》，《南开大学周刊》1931 年第 116 期。

②《九一八事变之经过及吾人应采之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 年第 105 期。

③《笨哉日本》，《东北半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6 期。

④公任：《国难中的感想和希望》，《九一八周报》1932 年 3 月 13 日。

人无团结心之故”。[①] 早期中日之间民族凝聚力有所差距，中国人尚不敌日人，有如报上所讲，“今日之中国，民族性仍属一盘散沙；日本之民族，则如水门汀之凝结”。[②] 1932年，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和中国的一般形势，调查团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淡薄甚感惋惜，认为“由该项简要之陈述以观，即可知分离力之在中国，现仍具有威权，此等不能黏合之原因，则以大多数民众，处于中国与外国间，呈极度紧张状态时，均系侧重于家庭或地方观念，而不重国家观念”，此乃该团在华半载所得之感想，面对外患之危急，“吾人能否消除家庭或地方观念，以增进国家观念，是在吾人今后能否改变人生观耳”。[③]

在东北事变爆发前，人们对于东北的关注并不多。“易帜”前的东北，实际上是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民众眼中的东北已由从前的“化外之地”转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对该地仍持偏僻、未开化的边疆地区的刻板印象。在东北事变爆发前，方维昌就在《冯庸大学校刊》上曾警醒人们对东北关注不够，“内地民众，注意东北问题的，固然很多，但是视如秦楚无关的，也很不少”。[④] 更有甚至，当时不少日本人对于东北的了解更甚于我国人。《大公报》上刊文《东北问题六十年总决算》上将中日两国对于东北的关注进行对比，日人长期钻营东北，但国人则甚少对东北问题投入，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从上至下，六十年来为吞并中国，策划不懈，多方努力；中国则一般社会，了解东北，留意研究者，实绝无而仅有。求诸书肆，凡关东北书籍，大抵译自日文，且皆为近三二年译本，足见从前之漠视；其地理图书，更非日本测绘者不可用。”[⑤]

东北事变爆发后，一时间宣传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诗歌铺天盖地，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热血沸腾，收复失地之情感甚烈。《东北半月刊》上刊载《东北青年论》一文，字字铿锵，号召青年们坚定保卫东北之信息，“我们唯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压迫我们的魔鬼，我们便要以迅速的努力，完成‘知己知彼’的作战，驾着时代的狂潮，完成收复东北的责任，我们还要坚绝的自信，自信已失的东北，必定在我们手里收回！”[⑥] 事关国家安危，戴季陶劝慰国人不要因为东北事变而失望悲观颓丧，因为中华民族决不能放弃他自己的独立而俯首于外人的宰割，中华民族也必将觉醒，“他（中华民族）有他自己底文化与潜力，任何民族拼着他的时候，最后没有一个不是负着悔恨失败而退避的，他底感觉似乎是迟钝的，但是他底反应力却是非常的大”，在戴季陶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虽然是丢掉了，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却将更加风起云涌，即“压迫最力的顶点，就是他复兴运动底始基”。[⑦] 当时的青年学生成为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宣传的主力军，在《“九一八”三周年之回忆》一文中，作者回忆当时的青年学生“除了督促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外，对于唤醒民众的工作，也不曾忽略过的，那时，广大的示威运动，游行，集会，到农村去等等热烈的紧张的空气，支配了我们青年学生整个的心，我们每个青年血管里的血液，正沸腾到最高的顶点”[⑧]，空气中洋溢着一派蓬蓬勃勃的战斗气氛。

“九一八”事变后，人们意识到只靠东北一隅对抗日本，无疑火中取栗，自取灭亡，所以提出“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东北是中国的新大陆”“东北是中国的东北”等一系列概念。东北事变爆发后，国人开始以“中华民族”为号召，呈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决心与意志，也在国际环境中为中国的形象带来了“好的批评”，顾子仁先生认为，中国自九一八以后，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产生了三点好的影响：“（1）经济绝交，……这种经济绝交，传到外国，他们觉得中国官吏，虽不抵抗；而百姓的民族魂，却还未丧失；（2）我国因一二八十九路军抵抗的影响，沪战月余，不但在国际间有惊人的印像，都觉得中国还有抵抗的

①《全国展开了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1页。

②《东北问题·民族个性》，《大光明》1931年11月26日。

③《中国对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批评》，《行健月刊》1932年第1卷第2期。

④方维昌：《东北民众应有的觉悟和训练》，《冯庸大学校刊》1930年第4期。

⑤《东北问题六十年总决算》，《大公报（天津）》1932年8月2日。

⑥寒姿女士：《东北青年论》，《东北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0期。

⑦戴季陶：《东北青年与中华民族复兴》，《东北青年旬刊》1933年第1卷第1期。

⑧庄夫：《“九一八”三周年之回忆》，《东北义勇军公报》1934年第1卷第8期。

能力；（3）东北义勇军，在国际之影响颇大……义勇军不是军事的破坏，而是经济的破坏”。①

二、“向内检视”：由“九一八”生发的向内审视与理性变革

东北事变爆发后，针对东北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审思成为当时民众关注的命题。事变的爆发揭示出过去人们对于东北地区的关心和了解不足，对于作战主动权与作战契机的把握不够等问题，促使国人反思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认识到东北事变爆发属意料之内，是内政、民族性、外交等多方面相互勾连的结果，并以期从这一过程中反思近代中国革命路径，抛弃不抵抗的幻想，结成全民族抗战的斗争基础，进而审视国民人格素养方面之不足，实现“向内检视”。

（一）“侵入之事，自在意料之中”：反思东北事变属历史必然

在东北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考察各方情形，认为东北事变的爆发实属意料之中，“东北事件发生乃一极可能之事实，盖门户洞开外人随时可入，日本邻我，相处最近，彼强我弱，侵入之事，自在意料之中，一日发生，岂有惊异之必要？国家之弱，民族之懦，内政之腐，人民之庸，种种使余烦闷忧愁之事甚多”②，可见中国内政之腐败、国力之孱弱显然，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日本来犯乃意料中事，即“此事出来，中国人大都惊慌，以为是意外，但在研究东北的人，都认为是意中之事。”③ 其实在1930年《东北新旭月刊》诞生时，发刊词中就已点名日本侵占东北的极大可能，“日本为人口过剩，扩张殖民地，早视东北为他们的优良的，外府于是我们的东三省便成为帝国主义者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啊！东北天然的土地广博，物产富丰，在全国说，算首曲一指，不怪引起帝国主义者的觊觎心。”④

时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行主任委员的王卓然在《东北大学校刊》中刊文回顾“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来由与经过，回溯“九一八事变，虽系一朝爆发，然其蕴酿，则由来渐矣”，他认为东北事变爆发前，东北地区建设已受到日人的关注和忌惮，“最招日人忌者，举其荦荦大端，曰移民政策，曰铁路纲计划，曰葫芦岛筑港”，加之当时国内环境相对动荡，即“我国自革命以后，反动叛逆所在多有，战局循环，元气大伤；加以长江水灾，延及十六省，难民七千万，全国生计均在动摇”，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日本提供了进攻东北的客观条件。⑤ 民国时期的知名报人陈彬和在文章中将近代中日关系归咎于孱弱的政治环境和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万案发生，韩案发生，青岛事件发生，以至最近中村事件之忽然发生，日人之蓄意挑衅，更露骨表现；直至兵临城下，枪迫胸膛，我们的长官还在做寿，还在俱乐部跳舞！”并在文章中引日本报人细野繁胜的书，“中国之军阀和职业政治家（官僚们）你说我左，我骂你右，全不顾一些正义，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均为其本色而视为生命，他们只图政治营业化与图谋满足私利私欲”，这段话虽然有荒悖无礼之处，但是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⑥ 谢光庭则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自19世纪已显见，但是国内政府并未有所准备，社会环境依旧是内乱频仍，即“自甲午战役以还，日本明显是我们的敌人，我国在军事上教育上及国防上，本应积极建设，一方面应该准备御侮雪耻，一方面更应该进图增高我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恢复我国旧有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事实不然，在清末之世，固无论矣，即在民国肇造以迄于今，复因国内变乱不已，在军事上教育上及国防上，仍未得积极建设，而至于有备无患，我国在物质上及精神上均予日人以可乘之机。”⑦

（二）“战争而所应组织的乃是整个民族”：宣传国民总动员

---

①《校闻：顾子仁先生在本校讲演（讲题：东北问题与国际关系）》，《河南大学周刊》1933年第22期。

②张伯苓：《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14期。

③张伯苓：《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大夏周报》1931年第8卷第6期。

④《发刊词》，《东北新旭月刊》，1930年。

⑤王卓然：《九一八事变之演进与前途之展望（附图）》，《东北大学校刊》1935年第6卷第11期。

⑥陈彬和：《国难中的东北问题》，《生活（上海1925A）》1931年第6卷第42期。

⑦谢光庭：《国难的认识和今后应有的努力》，《华北日报》1932年4月26日。

东北事变的爆发是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的结果，对于东北事变的研究与解决也应广泛关注中国革命道路、革命形势、军事实力、国际环境等繁复套叠的多方关系。基于此，当时国内产生了关于中国抗战路线的讨论，主战、不抵抗、依赖国际势力调解等不同观点众说纷纭，归根结底就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究竟有无实力与日本军对垒，从当时舆论声中可见，绝大多数民众还是主张奋力抗敌，宣传国民总动员与日人殊死一战。

东北事变爆发之初，部分民众对直接对日作战并不看好，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对垒日军不外是以卵击石。如南开学生认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实在不能和日本作战，这在事实上是很明瞭的，甲午之耻，大家当尚未健忘，而现在彼我的状况之较，更劣似甲午”①，认为当时的中国军事实力并无与日本较量的可能性，落后的国防实力无法带来所谓平等的外交环境。《东北问题》报刊上刊载时评，文中认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应该冷静看待，确实“迎合一般人之心理”，但是也要客观考量当时中国的国防实力。②

但更多的舆论则倾向于直接对日作战，秉持强硬的作战手段，团结最广泛的民众，开展国民总动员。多数民众主张与日本绝不两立，坚持“自动的外交政策，对外取积极步骤，尽外交之能事，而与各列强相周旋，对内则开诚布公，精诚团结，放弃私人成见，共决救国大计，出师‘收复失地，讨伐叛逆’，非打倒日本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不止!”③能否收复东北领土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国防安全，不仅需要东北人民投入战争之中，更要全国民众一齐努力。《大夏抗日周刊》上的一篇时评通过分析中国与日本抗战的可能性，即人口、武器和民族精神，以此鼓励人们团结起来与日人一战，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若说军队人数不够的话，那真是欺人自欺”，其次，“要是枪械的问题，我国先整理国内所有的军械，再设法募款和借款向外人购制，即使没有充分的军械，以偌大的军队，为了国家的存亡，也要作战”，再次，“我国的民众须有决心，因为自信是成功之路，使民气勃兴起来，为中国之存亡，早晚与日人一战以解决中日之纠纷”。④

“战争而所应组织的和武装的，并不是军队，乃是整个民族”⑤，精神动员和物质动员同样重要，只有号召国民摒弃党派与阶级之别，共赴挽救民族危亡的生死斗争，才能团结起最广泛的抗战基础。《国难中的感想和希望》一文中批判一些“反动分子”不肯投身抗战，作者认为面对国家的危急存亡之际，“各个政团即刻化除党见，各个私人即刻泯灭意见，全以国家民族的生命为最高无上的观念，精诚团结，澈底合作”。⑥白崇禧回顾东北局势，认为“九一八”爆发一年以来，东北的情势并未好转，热河方面却更严峻了，他号召全国一志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以最大的决心，做长期的抵抗，因为“我国以往外侮频来的缘故，就是因为全国民众不能团结，所以不能团结的根本原因：第一，是因为大家趋于个人主义，缺乏民族意识；第二，是由各界民众，没有严密组织；所以意志行动均不统一，如同一盘散沙。现在定要铲除个人主义，严密群众组织，一致努力对外，从心理社会两方面一并建设起来，才可以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在现代的国家，不是可以幸存的，处在列强环峙的里面，欲求避免侵凌，在国际上得到平等的地位，那就是非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于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同时努力不可”。⑦

（三）“改造人心，为一切之本”：推进国民性之觉悟

东北事变的爆发敦促民众回溯近代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层面的弱势，若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之危局，最关键的就是改变近代中国人思想之腐朽，塑造适应西方国际社会的国民人格与自立自强的民族意识。“民族也恰似一个人身体一般，因为内身多病，不能耐受困苦劳碌风寒燥湿毒菌破伤等等，便日就衰弱了”⑧，故从民族意志层面审视国人固有的心理“病症”就尤为重要。

---

①《对日本的侵占和劫略东北事件》，《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14期。

②木仁：《我国外交应有之政策（一）》，《东北问题》1933年第121期。

③木仁：《我国外交应有之政策（五）》，《东北问题》1933年第125期。

④《论著：中日一战可以解决东北问题》，《大夏抗日周刊》1931年第2期。

⑤石竹：《精神动员在现代战争上之重大意义》，《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1期。

⑥公任：《国难中的感想和希望》，《九一八周报》1932年3月13日。

⑦白崇禧：《怎样去纪念九一八》，载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编印：《九一八国难纪念专刊》，1932年。

⑧徐士达：《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之探讨》，《行健月刊》1933年第2卷第5期。

诚然，东北事变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如果从国民精神的视角考察则亦有迹可循，王卓然在文章中惋惜，“夫九一八事变之爆发，实为我整个民族亘数十年，泄泄杳杳，自私自利之总‘报应’，.....根本言之，其患实在国人之过于虚矫散漫，自私自利，惟其然也，故政治力量始终不能集中，遭遇空前之国难，而不能有当机立断之国策，此真令人扼腕叹息者也。”① 空前国难对当时青年的心理影响甚巨，《九一八周报》上有文章感慨青年群体流露出“冷淡的，消沉的，失望的”的心态，惋惜他们“没有环境愈困难愈振作的精神”。② 当时有学者将东北事变爆发后国民存在的普遍心理总结为“依赖心理、麻木不仁的心理、似是而非的觉悟心理”，并号召人们更应保有纯粹的爱国信仰，即“当此国难严重，民族存亡之时期，我们只有精诚团结，抛弃一切党的背景，来共同御侮”③，作者以为只有通过国民人格的修养，形成彻底的觉悟，才能“进到自救与实行的途径上去”，实现“上者克尽厥职，下者奋发有为”“由是则失地不难收复，内讧亦不难消灭，则症结自然扫除，民族复兴尤不难实现”。④

从历史脉络来看，“浸入世界”是近代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关注的进路，蔡元培在“五四”前夕已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⑤，东北事变后的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绝不是在世界之外，若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势力角力中赢得主动权，就必须从国民教育和国民性的塑造方面加以变革。认为面对波澜迭起的革命浪潮，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感慨，“要是没有厚重谨严的人格，怎能担当大任？要是不在这时候培养人格，到了大任当前，将怎样应付呢?”⑥ 冯庸大学的鲁凤鸣从当时东北地区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入手，号召从事教育的同胞应以“陶铸国魂”为己任，培养学生勇烈的爱国情怀，他认为“中国今日教育之所以不振，并非教育本身的错误，实因办教育的人无宗旨无目的，结果徒造出许多毫无宗旨不振拔的青年而已，现在我们既以智发人民为前提，教育当然以培养健壮的国民，勇烈精神为要务。”⑦ 张伯苓在东北事变爆发后，主张对学生的教育要多关注本国的事，还要注重学生的“不腐化”教育，即“第一，各大学要注意本国的事，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的短处，我们去监督政治，干涉政治，如果弄错，则格外坏，我们要找我们的一条出路；第二，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行，精神体格，在落人后，我们要一生一世不腐化！不尽责就是腐化，责备人和希望人，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都要借此机会觉悟，要终身不腐化!”⑧ 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在“九一八”两周年纪念会暨学校开学典礼上明确广西大学的三项教育目标，主张养成青年学生：“科学的知识，生活的技术，战斗的本领”，以达到‘救国’的大目的，马校长认为“说到‘救国’，向来大家都挂在口边，但是这决非‘空话’和‘标语’所能奏效的，必定的要经历一场‘苦战奋斗’”。⑨

三、“向外追寻”：东北问题更是世界性的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日本将其侵略东北的行径美化为“自卫权之发动，为维护日本在东北之幸福权利起见”⑩，面对如此颠倒黑白的说辞和日本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和民众曾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出面干涉，或国联主持正义，如何炳松所讲，“我们自己平时既无准备，一旦大难临头，就只有盼望他国援手的一法，或者

---

①王卓然：《九一八事变之演进与前途之展望（附图）》，《东北大学校刊》1935 年第 6 卷第 11 期。

②大我：《国难中青年的苦闷问题》，《九一八周报》1932 年 5 月 1 日。

③寒秋：《九一八事变后对于一般人心理之观测（一）》，《东北问题》1933 年第 164 期。

④寒秋：《九一八事变后对于一般人心理之观测（二）》，《东北问题》1933 年第 165 期。

⑤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918 年 11 月），载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外一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10-213 页。

⑥吴雷川：《爱国青年应注意的一件事》，《微音月刊》1931 年第 1 卷第 9、10 合期。

⑦鲁凤鸣：《今后东北人民应有之修养》，《冯庸大学校刊》1930 年第 4 期。

⑧张伯苓：《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大夏周报》1931 年第 8 卷第 6 期。

⑨《演讲：奋斗、工作与生产!》，《广西大学周刊》1933 年第 5 卷第 1 期。

⑩傅锡永讲，高仲元记：《日人强占东北之由来及吾人应有之认识》，《南开大学周刊》1931 年第 116 期。

盼望国际联盟出来主持公道，或者盼望美国和苏俄出来仗义执言”。①

（一）东北问题的命运关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斡旋

当时民众把东北问题的解决置于整体国际环境之中加以考量，关注到了国际局势、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等多个问题。报刊中多把东北事变形容为“国际战争”，其实是看重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太平洋势力之冲突问题，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孔庆宗在演讲中谈及，“太平洋问题虽极广泛复杂，而其总焦点实集中于我国，太平洋问题，可以说是东亚运命问题”，而之所以中日冲突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其实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均势被打破，产生三大危险：“（一）各国因争求毫无把握，不可捉摸之未得权利，自相冲突，不知所属；（二）已得之殖民地有动摇损失之虞；（三）中国非其他落后民族可比，文化高尚，聪明善战，勤俭耐苦，富于抵抗力，三大冲突，绞成一团，纠纷无已，则世界和平，完全破坏。”② 与孔庆宗相似，当时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李华春在其文章中谈及他由东北事变引发的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格局的思考，他认为“东北问题的归宿是要靠帝国主义的妥协或冲突而决定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出让，东北问题不会得最终的解决，日本的独占，东北问题更得不到最后的归宿；只有帝国主义间的妥协或战争，才是决定东北命运的最后关键。”③

此外，东北问题的爆发更折射出近代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实力角逐。仲航（笔名）从国际环境入手，他认为若研究东北事变爆发的原因，需要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思考，决不能仅局限于东北本身，他将事变爆发的原因概括为三对矛盾：第一，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间，为着各自的侵略政策，利害上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第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对立，这种对立带来资本制度的经济榨取；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国在日本看来是与苏联同样站在社会主义阵营。④《申报》在1934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与仲航的观点相似，文章也是将东北事变的爆发概括为这三对对立关系⑤，作者认为，“最近的国际事件是时时刻刻在变动的，这三组的对立虽然仍是尖锐的反映在东北及中国的全部，但因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力的对比上起了变化。”⑥

东北问题在国际关系层面牵涉甚广，除中日外，还有英法美俄等多国都是加入争议的半当事人，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的归属与分割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若将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某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中国伸张正义，大抵都“无济于事”。当时著名的民族运动学者董之学在文章中写，“假如英美法，毫不自私自利，而联合一致的站在中国方面，则定可以强迫日本吐出已经吞下的肥肉（这是中国人现在所希望的，假如他们站在日本方面，自不待说，定可以保障满洲永远为大和民族的一块领土，然而事实毕竟不是这样简单”。⑦

所以客观讲来，依赖帝国主义国家最多只能实现拖延危机的爆发，而无法根本解决东北的危机。这一点从中日上海战争发生后，旅沪某德人的通讯中就可以看出：“旅沪欧人虽绝对与被强占之中国人同情，但终不能不左袒日人，盖彼等深知如中国此次战争获得胜利，则欧人亦已矣；其租界必将归还中国管理，对于此点尤以租界之高级官吏最为恐慌，因彼等肥缺，月薪三千两必将从此告终也”⑧，足以窥见列强对于中国一般之心理。哈佛一政治系教授曾言中国人想夺回满洲，只是凭借法律上之解释而已，但从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念来看则立不住脚，“唯是主权之说，中国人眼中之主权与西人眼中之主权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眼中

①何炳松：《中日问题和世界形势》，《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9期。

②孔庆宗、孙邦智：《讲演东北事变与国际关系（上）（九一八纪念演讲）》，《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2年第1卷第8期。

③李华春：《东北问题之回顾与前瞻》，《东北大学校刊》1935年第6卷第11期。

④仲航：《现阶段的东北问题》，《东北问题》1933年第199期。

⑤对于这三对关系的具体分析《申报》上也有刊载，即《怎样研究东北问题（四）》，《申报》1934年3月24日；《怎样研究东北问题（五）》，《申报》1934年3月25日；《怎样研究东北问题（六）》，《申报》1934年3月26日。

⑥《怎样研究东北问题（三）》，《申报》1934年3月23日。

⑦董之学：《东北问题的展望》，《新社会》1932年第3卷第12期。

⑧《九一八与中华民族的自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编印：《九一八国难纪念专刊》，1932年。

之主权，当如罗马帝国时代所称之主权也”。①

（二）民众对国联的态度发生转向

忧心于东北问题的解决，起初人们信任国联，企图将东北事变的解决和维护中日之间的“公理”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即“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更没有十分好的办法去对付，要以现在中国军队的力量，用武力来收回东三省，在军事上是毫无把握的，所以政府始终采用和平政策，请国际联盟依法来解决东三省问题”②，产生出一种“可怜的依赖性”。

起初，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曾致电国联调查团，表达希望国联主持公道的期望，“兹闻贵调查团业已辱临吾国，占山为救国计，遂决然冒最大之危险，设计自日军严密监视下之齐齐哈尔潜来黑河，执行黑龙江政府职权，一切政务秉承中央照常进行。……务请贵调查团对于此层特别注意，加以实际之调查，以作实际之报告，则世界人类和平之前途方得保障，贵调查团之有功于世界人道亦得永垂不朽焉”。③ 按照李华春的说法，当时人们坚信“国际终有公道”的原则下，中国对日政策，自然只有“求神问下”之一途，在“无抵抗主义”之外，同时产生的，便是“依赖国联”。④

国联辗转多地调查东北事变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们虽宣布日本是侵略国，但对于日本的制裁却未能落实，这令东北民众极其失望，对于国联的期待放低，认识到国联本质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工具，即“国联之在今日，与其谓为和平之机关，毋宁谓为强盗之团体，与其谓为人类之福星，毋宁谓为宰割弱小国家之工具，国联虽有会员五十余国，然与东北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之美俄两国迄今犹遥立于联盟之外，而操纵之者，则又为素昔与日本勾结著称之英法两国，英国保守党方握政权，不忘英日同盟之旧感”⑤。对于国联的认知变化促使国人认识到政府对国联的盲信也进一步造成了外交的困局，即“一，误解了这次事变的真正意义；二，没有看清列强的国际关系，三，盲目的信赖（注意！不是利用）国联而致失败了”，要挽救这种革命颓势，就必须“以恢复民族的精神为前提”，主张以强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推动新的革命政策的实行。⑥ 诚然，伴随着对国联的幻想破灭，民众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势力的认知也更加清晰，即“决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别的国家受武力的压迫，而出来不顾一切以武力帮助那个国家，有的时候许多国家联合起来一致作战，他们能够联合作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国际上只有利害关系；利害相同才有人肯主张公道，利害不相同就是主张公道也不过是口上说说而已”。⑦

（三）东北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民族独立自强

纵观当时的世界格局，人们逐渐认识到面对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有依靠国家本身的独立和强大，才能实现“自救”，正如当时的学生所感，“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已没有正义的存在，人类间的帮助和同情是不可靠的，我们唯有依傍自己，我们唯有此后自求挣扎。”⑧ 事变爆发期间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杜光埙在演讲中指出列强冲突的局面总是不可靠，“还是要自己振作，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的国家”。⑨

民众逐渐认识到东北问题早已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而且“不抵抗政策”也只能延续纵容日本侵略的行为，只有改变政策，积极抵抗，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才能为东北争取一线生机。正如何炳松在文中所谈，“国际的攀附和个人一样，原是一种自堕人格的行为，立国于现在的世界，那有幸存之理？”⑩ 有学者刊文从

---

①王玉玢：《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华之舆论》，《行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

②《九一八事变之经过及吾人应采之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年第104期。

③文俊雄：《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查团函电选》，《民国档案》2011年第3期，第17-44页。

④李华春：《东北问题之回顾与前瞻》，《东北大学校刊》1935年第6卷第11期。

⑤陈天任：《国际现势与东北问题之出路》，《徐中》1933年第2期。

⑥蒙科：《东北事变与我国民族精神》，《国立中山大学同学会学报》1932年5月，创刊号。

⑦《九一八事变之经过及吾人应采之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2年第105期。

⑧《对日本的侵占和劫略东北事件》，《南开大学周刊》1931年第114期。

⑨杜光埙、崔连才：《演讲：日本出兵满洲后的国际形势》，《国立青岛大学周刊》1931年第1期。

⑩何炳松：《中日问题和世界形势》，《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9期。

日本的政治演变出发，分析在政治氛围激化的环境下，中国已无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即“事至今日，则万无进行直接交涉之可能，设此时向日交涉，除非断送东北，整个承认伪国予日本外，殆无他道”，进而鼓励国人团结起来，坚持全民族抗战，“必团结御侮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撇头颅于黑山白水间，洒热血于黄海及鸭绿江畔，人人有必死之决心，人人有杀敌政果之勇略”。①

经东北事变一事，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则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武装国家实力。在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国民党、共产党等领导力量的认知也在发生嬗变，不同政治力量在民众心中的权势升降随之展开，特别是民众对共产党的态度转变明显。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在国内的“剿共”政策，民众期待政府当局加以调整，以保卫东北为先，当时《国闻周报》上刊载了国人的六点倡议，即“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维持邦交”之精神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②《申报》上刊载一文章肯定共产党之施政纲领，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吾人认为今日之共产党，彼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其产生、其扩大非为偶然。……以故吾人认为今日之‘匪’，超非‘剿’所可‘灭’，思想不可禁锢，亦非禁锢所能阻遏，欲言‘绥靖’，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之民主政治着手，民主政治建立，由解决土地问题，进而建设非资本主义之民生主义的社会，而后民乃得生，社会乃得繁荣，社会秩序乃得永从安定，除此而外，吾人诚未见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③

Looking Inward and Seekinging Outward: Public Opinion and Reflections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ZHANG Zhao-h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people of China realised that the outbreak of the incident had a profou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that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incident was not only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a game of interest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was synchronised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whole Chines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refore, the solution of the northeast question could not rely solely on the people of the Northeast, but should be the effort of the whole nation. In this process, people's perception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and the face of the western world also became clearer, showing an 'inward looking' at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s power, and an 'outward seeking' for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modern China into the world and a solution to the national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public opinion; outside world; path of revolution

[责任编辑　山阳]

①重三：《从日本最近政治演变说到收复东北失地》，《行健月刊》1932年第1卷第1期。

②《我们的希望》，《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

③《论绥靖》，《申报》1932年4月12日。